

论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

——一种方法论的探讨

白建灵

在人类的群体性划分中，民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民族是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则和普遍现象。任何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通过内部认同和外部别异实现的，这使任何民族都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纵观各民族的发展史，每个民族在实现内部认同和外部别异的过程中，宗教都发挥有重要的作用。就宗教而言，它自身也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宗教在民族认同和别异中的作用，可以表述为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对民族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中性”的概念，普遍适用于每个民族，因此，它也具有了认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宗教 认同性 别异性 方法论

作者：白建灵，1974年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宗教学博士。

一、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对民族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

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任何社会都是群体性的存在。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既会因利益、信仰和其他因素的一致而形成群体，也会因利益、信仰和其他因素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群体。但凡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必然会对群体进行内部认同和对其他群体进行外部别异。一般而言，一个群体的内部认同是通过对其他群体的外部别异同步实现的。可以说，要认同就必然有别异；不通过别异也不可能产生认同。认同和别异二者从概念上可分析为二，实质则内外一体。

在人类的群体性划分中，民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民族是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则和普遍现象。纵观人类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宗教以人类文化的重要形式，一直对民族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宗教对民族社会发展的作用，一般而言，是通过神圣化民族认同和别异的方式实现的。

通过考察关于民族的各种定义，发现它们集中突出了一点，即各种要素的“共同性”，如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共同地域、共同血缘、共同语言、共同宗教、共同文化（生活）、共同民族意识，或者直接表述为认同感和一体感。所有的定义都强调民族的这种共同性，表明这种“共同性”对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了“共同性”，拥有这些因素的人群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强调民族的这种共同性，也表明这种“共同性”有一个从“不同”到“共同”的发展过程。从不同到共同，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由单个人追求共同性而结合为一个民族群体，而是由不同的较小群体通过认同而达到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比如从氏族到部落到民族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在民族共同体内部，这些较小的群体，无

论是先前就有的,还是后来分化新生的,都会在对民族认同的同时,依然保有自身的群体性特征。也即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内部的群体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先前的差异性,产生了追求乃至实现的共同体;又因为差异性在内部的长期存在,使得维护共同性成了恒久的追求。民族群体的共同性和民族内部的差异性并存。

民族群体的共同性和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并存,说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既可以发展成为民族的共同性,又是民族共同性长期发展的一种潜在威胁。因此,民族共同性的形成和保持需要长期经营。对民族共同性的经营需要藉一种“文化力”。这种文化力应该能够赋予民族共同性以一种合法性和神圣性,从而使民族成员能够自觉奉行。形成和保持民族共同性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力,来自民族群体外部的自然的或其他群体的直接或潜在的威胁;一种是内力,赋予民族各构成要素以一种神圣性,具有凝聚民族内部不同群体和别异其他民族的力量。外力是普遍和长期的现象。外力普遍和长期的作用就使内力必须具有神圣性,并且这种力量越神圣,它所起认同和别异的作用就会越大。

赋予民族共同性以合法性和神圣性的力量,并不足以消除民族差异性造成的离心力,其功能的有效性只在于对民族差异性造成的离心力的克服,以及对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当这种力量被赋予民族全体,服务于民族共同性时,就会通过别异他族,克服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起到凝聚民族,增强民族认同,形成一体化秩序的作用。当这种力量不能有效服务于民族全体时,民族内部的差异性就有可能被扩大,造成民族的分裂。这种神圣力量的作用,对单一民族是如此,对多民族一体化的大格局来说,也是一样。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虽然也有分裂局面,但大一统的文化取向,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保持和加强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这种具有神圣性的力量就是宗教,或者说是“准宗教”。任何宗教都必然会和一定的群体进行一体性的结合,或者说“宗教是随同和通过人类集体生活而发展起来的”^①;人类的集体生活方式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宗教之所以能和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的人类群体进行一体性结合,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种独特性。它的这种独特性可以表述为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宗教对民族群体的历史作用是通过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对民族这种群体社会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实现的。

民族和宗教,它们既有相对的独立性质,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史一再证明,越是在民族的早期,宗教和民族社会的结合就越紧密。随着民族的发展,宗教和民族社会的结合程度逐渐走向松弛,或者说宗教自身的独立性越来越突出。宗教独立性的发展指的并不是宗教与民族社会的脱离,而是说宗教与民族社会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宗教也相应地表现为三种形态,即 1. 氏族-部落宗教; 2. 民族-国家宗教; 3. 世界宗教。

近现代比较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用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早在人类最初创造宗教神灵的原始时代,宗教就已成了当时社会各种文化的总汇”^②。在原始时代的氏族社会中,宗教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二者是“浑然一体的”^③,或者说氏族社会的图腾观念直接体现为氏族意识,图腾崇拜物就是氏族对内认同和对外别异的标志。通过把图腾观念社会化和制度化,要求每一个氏族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并依此而形成氏族社会的“神圣传统”,从而

① (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134 页。

② 吕大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载《从哲学到宗教学》(吕大吉学术论文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45 页。

③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 349 页。

保持了整个氏族的共同性，维持了氏族社会的“一体化秩序”^①。随着氏族—部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组织分化为更小的家族或家庭组织的同时，整个氏族、部落又联合成了更大的民族群体，人类历史进入了民族—国家阶段。与氏族宗教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浑然一体不同，在民族—国家里，宗教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弛，或者说民族—国家社会里分化出了宗教专职者和世俗专职者，宗教特权阶层和世俗特权阶层。相应地，宗教的神圣事业和社会的世俗事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分野。这种分野的现象说明：在国家或社会经济的富余化发展下，有了一批专门从事宗教文化事业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专门侍奉神灵（实际上是在神庙中侍奉神的象征物、住持祭仪、觐知天命和神意）的祭司集团和巫祝阶层。”^②所谓“君权来自神权”，“神权服务于君权”，是说宗教特权阶层和世俗特权阶层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二者的关系不是完全分立的，而是统一的或同盟的。^③这种“统一”关系是一种由氏族制与图腾制“浑然一体”状态发生分化但又未完全分立的状态。这种虽然已有分化又未完全分立的政教关系，或者说这种国家宗教必然“具有全民信仰的种族或民族宗教的特征”^④。在传统社会（氏族—部落社会和民族—国家社会）里，宗教对民族群体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和强化，可以表述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祭祀”；也可以表述为“神只歆同类，民只祀同族”，“鬼神视其族类，而歆祭祀”。具体而言，就是宗教的观念表现为民族的意识，宗教的感情内化为民族的感情，宗教的行为和活动成为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结合或服务于民族的组织和制度。传统的宗教信仰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强制，通过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认同和别异，加强了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秩序。

随着民族之间的征服活动，出现了多民族的帝国形式；与帝国形式相适应，出现了超民族的世界性宗教。这是指它不再是某一特定民族的民族宗教，而是变成许多民族共同拥有的宗教。但由于民族自身独立性的存在，使某一宗教的世界化发展都会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或者说，世界性宗教是通过民族化而实现其世界化的。与世界性宗教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比如汉族，既信仰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又信仰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一种是多个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藏族、土族、裕固族都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都全民信仰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以及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都信仰基督教，等等。世界性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宗教和民族的关系，不再像传统宗教时期那样单一，而是呈现出更为多彩和复杂的内容。由于世界性宗教时期，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多彩和复杂，故需要对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中性”的概念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宗教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它作为方法论必须具备“中性”的态度和立场，是个“中性”的概念；只有中性的概念，才能有效地适用于研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说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中性的概念，主要在于：

首先，它在现象上是普遍的。正如前面所说，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

①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545页。

② 同上，第622页。

③ 吕大吉教授认为“在君权来自神权，而且在现实的宗教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君权与神权常常是直接统一的。”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冯天策认为“统治集团把某一特定宗教作为神学统治的精神力量，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结成君权和神权的神圣同盟”。冯天策《宗教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④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623页。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对群体社会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任何一个群体社会几乎都信仰一种或几种宗教,因此,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也具有普遍性。宗教是人类群体性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客观性;宗教自从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以来,就与民族社会持续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宗教都会通过其认同性和别异性来满足任何一类群体社会的各种需要,如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经济的、风俗的,等等。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在轴心时代以前,其表现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总汇,或者说各种社会文化都宗教化了;轴心时代以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相继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具有了其独立的价值,表现为世俗的文化。虽然宗教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都成了世俗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宗教完全决裂了,而是仍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如轴心时代三大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希腊哲学的发展变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印度佛教哲学自身宗教化了,中国儒家学说虽然以哲学伦理作为核心和内容,却也采用了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形式,二者形成了“内容与形式,里与表”^①的关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的觉醒,形成了对基督教或宗教的猛烈批判,甚至是彻底的否定,主张用科学代替宗教。但伏尔泰、康德等一批学者仍然承认宗教的合理性及其社会价值,主张在信仰和社会的领域继续为宗教留有余地;不过,宗教能否在信仰和社会的领域保有余地,不是依靠“别人”的施舍,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基督教通过路德等人的改革,在适应了科学和理性时代要求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演变成西方世界的文化底色。甚至在最具现代性的美国,宗教不但形式花样繁多,而且其新教的基要派表现出比欧洲天主教更多的保守性,美国的新总统都要以《圣经》的名义宣誓就职。可见,宗教不仅是一般民众的需要,而且还是国家政治神圣性来源的需要。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宗教对民族社会的作用,具有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普遍性。

其次,它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宗教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力量,它本身并不先天就是善的或恶的,只有当它被人类群体使用的过程中,因为会产生有利和有害的效果,才会产生伦理上善的和恶的评价。对宗教的信仰者,或者说信仰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宗教是至善的、仁爱的、和平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心中充满了挚爱的情怀,不但自己对其所信神灵歌颂礼赞惟恐不及,礼拜献祭惟恐不周,甚至不允许信仰其他宗教者或不信仰宗教者对他们所信宗教的任何指责和批评;对于无神论者,他们对宗教进行了否定,认为“宗教是鸦片”,是“谎言”,是“绝对荒谬”的,甚至认为宗教应该完全消失。因为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身的特点,当它对某群体有利时,相对可能会对与该群体对立的群体有害;对某群体来说是善的,对与该群体对立的群体来说可能就是恶的。当群体社会之间因为经济等世俗利益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发动战争时,他们往往都会以宗教的名义,祈求神助来实现他们世俗的目的,如春秋时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②,晋侯向神祈祷说“帝许我罚有罪矣”^③,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上朝圣时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屠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④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当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所谓“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争,都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的不同形式的战争。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性的异化;所谓人性的异化,实际也可以说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综观各种宗教,一般而言,它们总是以“善”或“至善”为追求目标的,并且也创造了具有良善价值的历史事实,虽然伴随这一追求的

① 吕大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载《从哲学到宗教学》,第803~804页。

② 《汉书·郊祀志下》。

③ 《左传·僖公十年》。

④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81~282页。

过程，它们也或多或少的造就了孽或恶。无论良善，还是孽恶，都是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实际应用中被扩大的结果。所谓药无优劣，以治病为良善，以害命为劣恶，二者理实相同。正如杜兰（Will Durant, 1885 - 1972）所说“理念比所见所闻更真实，……‘普遍性’……永恒地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本身比任何一个人人都更真实，美本身比任何玫瑰花都更美”^①。因此，对人类历史上以宗教的名义，或者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发生的矛盾、冲突以及战争造成的所有不幸，只有站在伦理意义上的中性立场，通过宗教认同和别异的相关性，才可能得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具有普世伦理的评判标准和体系。

最后，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它本身既不能强化民族，也不会分裂民族，只有它被用于强化民族时，才会加强民族的凝聚力，被用于分裂民族时，就会形成离心力。它也不会无时无刻地强化民族和分裂民族，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才会产生这种需要，进而宗教才会发挥相应的作用。无论它强化民族，还是分裂民族，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即都是通过认同性和别异性来实现的。并且，强化民族，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不等于就会推动民族进步、社会繁荣；分裂民族，形成离心力，不等于就会迟滞民族进步、经济发展。强化民族，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或分裂民族，扩大民族的离心力，只是方法和手段，其目的应该是：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否被用于推动民族进步、社会繁荣的事业？用于该项事业，则可能会推动民族进步、社会繁荣，否则，又可能会迟滞民族进步、社会繁荣。从世界民族及民族关系看，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性存在的基本前提；当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表现得相对平和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频繁和兴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就会增强，其结果往往是和平与秩序；当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表现得相对激烈时，各民族之间隔阂和矛盾就会增强，其结果往往是战争与混乱。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价值上具有中立性，它不会只对哪一个民族情有独钟，情偏意爱；也不会专对哪一个民族天生恶意，眼恨心仇。因此，只有站在价值意义的中立立场，才能基于人性和人道，使宗教在全世界追求民族平等、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福利，以及人类的和平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不同的宗教类型具有程度上的差异

任何一种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众。信仰同一宗教的民众——不论属于同一个民族，还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都会通过该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感情或体验、行为或活动组织和制度，来实现相同信仰者的认同，对其他宗教信仰者进行别异，形成信仰群体。认同性和别异性，这是宗教信仰的一般特点。虽然各种宗教都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但不同的宗教类型在这方面的表现却有程度上的差异。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大体可以分属两种类型，一种是多神教类型，一种是一神教类型。不同的多神教既各自信仰不同的“主神”，也崇拜多个神灵，诸多神灵之间只存在地位高低的问题。在氏族—部落、民族—国家时期，各民族既认为自己所信神灵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也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所信神灵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在世界性宗教发展阶段，既发展出了超民族的神灵，又把不同民族的神灵包容在这一宗教的体系之内，比如佛教在向各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会把不同民族的神灵吸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如藏族的雅拉香波、念青唐古拉、拉库日达、活德巩甲四大山神和十二丹玛女神，土族的神箭护法神，裕固族的王子护法神，等等。又如中国正统的国家宗教（牟钟鉴教授称之为“宗法性传统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是多神教。它们之间也曾发生过长时间的争论，这是不同宗教之间别异性的一般表现。经过争论，儒、释、道三家通过认同和

^① Will Durant, *The Pleasure of Philosophy*, p. 16 - 17. 引自杨慧林著《圣言·人道——神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别异,形成了世界宗教史上独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现象。这种“三教合一”的现象,既有它们相互认同的统一性,又有各自认同的差异性;统一性使它们相互亲近,差异性使它们相互尊重。如宋明理学家对佛、道在政治伦理上持批判态度,在哲学上则多有摄取;儒、道在政治理论上对儒学多有摄取,在宗教信仰方面则保持各自的独立品性。“三教合一”的关系是“理一教殊”的“和而不同”关系。对儒、释、道的这种关系,明代僧人元贤表述得非常透彻。元贤一方面主张三教的合一,一方面主张三教的不同,认为二者不可混同。据此,他对中国化禅宗的颓败之风,从“灭如来种族”的角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进而深刻地指出“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①。在一神教里,比较典型的有属于民族-国家宗教的犹太教,有属于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摩西时代,要求犹太民族只信仰唯一的神,不可有别的神,到巴比伦之囚时代,又产生了耶和华是唯一真神,产生了唯一神的概念,有了神灵的真假观念。也就是说,犹太教的耶和华是真神,其他民族的神是假神,这种真假神观念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宗教的多神观念是一种巨大的演变,真假神和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神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种真假神观念直接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绝对唯一神观念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继续把犹太民族的唯一真神发展成全世界的唯一真神。认为其他宗教的神灵是假的,或者认其为“魔鬼”,它们的神灵都应该消灭,甚至信仰这些神灵的信众也应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否认其他民族宗教神灵的合法性观念,很容易产生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缺乏包容性行为。这种一神教的信仰宣扬为信仰本身而进行斗争,如以色列人为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便以犹太教信仰的方式要求以色列人排除,甚至消灭原住该地的其他非以色列的各部族,基督教的耶稣说他到这个世界上不是给人们带来和平而是带来战争,伊斯兰教讲为主道而战的人,可以带着血衣进入天堂。这些宣传被明确写进《旧约》、《新约》、《古兰经》中,因为这些经典的神圣性,这些主张也具有了神圣性。这就使也许当时具有合理性的宣传,变成了永久性的宣传;经典的不可变更性,使它形成了自身具有的特性。^②相对而言,多神教的包容性要大一些,彼此之间的排他性要小得多,甚至可以互相包容;一神教的包容性要小一些,彼此之间的排他性要大得多,相互很难包容。因此,在世界宗教史上,各种多神教之间似乎从未出现过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生的宗教战争,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没有发生过战争。它们在民族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时斗争也非常残酷,如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与苯教之间的斗争。当藏传佛教形成后,又能从中看到很多苯教的内容,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斗争过程也是相互容纳的过程。而一神教之间却出现过残酷可怕的斗争,以致发动过长期的宗教战争,如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曾发动过长达六次之多的十字军战争;一神教的各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甚至比一神教之间的斗争更为残酷,如基督教内部的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的胡格诺战争曾长达三十多年之久(1562至1598年);伊斯兰教哈瓦利吉派有时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清教派,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哈瓦利吉派对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火教徒表示宽容,同时却对不接受他们教义的同教的穆斯林越来越不加容忍。”^③“相传有一次穆阿台及勒派的领袖瓦绥尔·伊脱落在他们手中,自己只好假意承认是多神教徒,他认为承认是一个多神教徒比承认是一个反对他们的伊斯兰教人还容易得救。哈瓦利吉派

① 《藏言》,转引自牟钟鉴著《中国宗教与文化》,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② 美国学者亚瑟·亨利·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认为,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这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梅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参见该书“多元信仰”部分,乐爱国、张华玉译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③ (苏)叶·亚·别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对异派伊斯兰教人，异常虐待，虽老弱妇孺，也好不怜惜。”^①相对而言，伴随着一神教之间的相互斗争，并没有出现相互融合的现象。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主要表现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这说明一神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更为强烈。当然，这些举例只为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不同类型的宗教具有程度上的强弱差异，这种强弱差异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相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各宗教之间并不是“仇必仇到底”，而是“仇必和而解”。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质上是有利于各个民族、各种群体共生共存的，因此，虽然它们之间总不免会发生斗争，甚至还很残酷，但它们却总是各自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和进步的。人类源远流长的进步历史本身无可争辩地说明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之间的主流是共存共荣的。继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后，同样是美国学者的杜维明又大力提倡“文明对话”，乃至要建立对话文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和英国学者阿·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中，提出人类宗教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向多神教的回归”。当下全球性的文明对话热潮都致力于建立和平、和谐、秩序的社会。考察所有这些活动和主张，都是建立在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基础上。只有首先承认了宗教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以及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在“存异”的前提下，对“求同”作出努力并获得硕果。

四、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

在多元一体格局内，个体对群体的归属关系，必然会表现为认同和别异的多层次性，如中国的56个民族，既各自认同于所属的民族，与其他55个民族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于中华民族，共同别异于中华民族之外的民族。与此相适应，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也会表现出多层次性，如伊斯兰教在中国，既有回族化的认同和别异，又有中国化的认同和别异，这与回族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应的。

此外，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尤其是三大世界宗教，每种宗教内部又分为不同的教派，每个教派和整个宗教又共同构成了不同的信众集团或群体，各个教派在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的同时，又一起认同于所属的同一个宗教而别异于其它的宗教。在多教派的同一宗教内，也会出现认同和别异的多层次性，如藏传佛教内的各个教派，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是佛教而共同别异于苯教等其他宗教；又如基督教内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于基督教而共同别异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内的逊尼派、什叶派、穆尔太齐赖派等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于伊斯兰教而共同别异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这种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人类群体的组合过程中，既有基于血缘关系的组合，如家庭、氏族或部落；又有基于地缘关系的组合，如民族、国家；又有基于信仰关系的组合，如各种宗教及其教派。在这种组合关系中，血缘是基于人的生物性而进行联系的，它是最固定和最保守的；地缘关系是基于人的社会性而进行联系的，它可以超越血缘关系，实现多血缘的联系，相对更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信仰关系是基于文化性而进行联系的，它可以超越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实现多血缘、多地缘的联系，是最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的。正因为信仰的这一特性，宗教才会走出氏族一部落，民族一国家，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发展形成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正因为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超血缘、超地缘的特性，人类社会才会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出现群体性联系的多层次性。在人类以氏族一部落、民族一国家、多民族国家或帝国为单位的组织过程中，相伴随总会出现氏族一部落宗教，民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页。

族—国家宗教, 以及世界宗教。也许有人会说, 只有氏族—部落、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后, 才会产生相应的宗教形式, 这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只是对群体性联系中多层次性事实的肯定, 而不是创建。此论不错。但如果没有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肯定, 这种群体性联系的多层次成果如何能够保障或保持? 越是超血缘、超地缘的群体就越需要通过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来神圣化其组织的合法性, 如所谓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在人类群体性组织的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人类群体性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较大群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较小群体的消失, 而只是较大群体对较小群体的容纳。当然其容纳的形式可以多样, 如民族—国家内, 氏族、部落的继续存在; 中国多民族国家内羁縻府州的设置, 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内行省的设立, 以及近代英吉利帝国内殖民地的设立, 等等。虽然形式可以多样, 但容纳的本质却是一致的。上述较大群体组织是否能够合法与长久, 可以说与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效果是成正比的。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一书中, 对罗马帝国和中国进行了对比, 他指出罗马帝国在军事强大的同时, 却因“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而使“罗马人的心灵永远居于幼稚状态”, 进而导致“人类的灵魂和精神都衰退了”。中国却在“思想上维持团结直到近代”, “自从汉代以来, 中国经历了政治命运上的巨大盛衰兴废, 但是从未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它曾经分裂过, 但它总是又恢复了统一; 它也被征服过, 而它总是吸收和同化了它的征服者。”^① 两相对比, 我们看到的是军事、政治力量功能的短暂性和宗教、文化力量功能的久远性。

信仰关系是基于文化性进行联系的。在人类早期社会, 各种文化形式曾被统摄在宗教体系之内, 宗教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的总纲和核心。近代以来, 文艺复兴打破了这一宗教统摄的格局, 各种文化形式纷纷获得了独立发展。在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各自发展过程中, 人性得以凸显和张扬。伴随着人性的凸显和张扬, 社会人群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 人权和民主成了社会组织的依据和原则。与之相适应,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也发生了演变, 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也越来越多地被吸纳进来, 宗教世俗化的倾向也很突出。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神圣化仍然是任何一级群体得以组织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神圣化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群体, 其必然是松散的, 也是极易分裂或分化的, 或者说其群体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必然是极弱的。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 并不等于多层次性的群体在任何一种宗教或文化体系内都能长期有效地保持。要使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多层次的群体社会中发挥长久有效的功用, 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1) 人类追求至善的核心理念; (2) 具有包容性的态度和政策。对此, 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以中国明朝为例, 一方面, 明政府强调有以“一体为仁”和“平等”的理念治国, 如朱元璋在诏书中讲“我国家受天命中, 统御万方, 思抚善良, 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 咸推一体之仁”^②, 明成祖讲“人性之善, 夷狄与中国无异”, 应当“不分等类, 验才委任”^③。另一方面, 明政府在尊崇“仁政”的前提下, 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了包容性政策, 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 汉族在一个民族里, 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其荣的态度”, “就是到了君主制发展到最高度的明清时代, 统治者也只要求应试的士子在试卷上必须按经义代圣贤立言, 却不管你所信仰的到底是

① 参见〔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 27 章, 吴文藻、谢冰心等译,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② 《明史·西域传三》。

③ 《明太宗实录》卷 126、53。

圣贤，还是神仙，是周公、孔子、孟子、程朱，还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或安拉真主”。^① 只有以至善作为终极的价值追求，才可能采取具有包容精神的宽容政策；只有采取了具有包容精神的宽容政策，才有可能体现乃至实现至善的追求。

五、小 结

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认同和别异来实现群体的独立性，同时也在于通过认同和别异来达到群体间的共存状态，这是认同和别异“内外一体”的本质所决定的。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虽然是对民族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但二者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民族之间的共存状态意味着民族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和联系，民族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说明在民族交往中，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追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原则。民族利益的表现形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属于单一民族的私有利益，一是属于多个民族的共同利益。从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看，每个民族都在通过认同和别异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发展。由于民族有强弱差异，其利益最大化发展也是有限和相对的；民族利益最大化发展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使共赢必然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进而表现出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②，其最终的趋向是走向各民族的多元并存状态，实现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普世性价值。

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普世性价值，既强调多元性的价值，又强调统一性价值，是多元性和统一性价值的和谐。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作为“中性”概念，其积极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类群体走向“多元性的统一”状态。这种民族间“多元性的统一”状态，在精神上表现为“和而不同”的文化和心理境界。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不同类型的宗教表现有程度上的差异；使信众在群体的隶属关系上，表现出多层次性。这种现象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作为中性概念，在实践中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现象，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在于服务于人类自身。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考量宗教能否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关键在于人类能赋予宗教什么样的品性。从雅斯贝斯的轴心文化理论出发，哲学的、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似乎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人类各民族间“多元性统一”状态的形成，取决于理念上对至善的本质和意义的追求，实践上采取具有“宽容精神”的政治举措。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否“唤醒所有人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空间内共同生存的意识”^③。

宗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形式，是服务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为了使宗教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需要以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为方法论，以人类社会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为基本事实，努力深入研究，以求达成共同生存的意识，追求人类自身的文化建设，社会人群的和平与幸福。

（责任编辑：于光）

①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载王元化主编《释中国》卷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3～1635页。

② 〔德〕康德在其《实用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每个民族都试图通过奴役相邻的民族来加强自己，这就会成为扩张欲；而如果没有对别的民族占到上风，就会产生怕被别的民族吞并的恐惧：这样，我们人类的内部或外部的战争即使是如此巨大的一种灾难，但当天意的机巧虽然使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摩擦中相互抵消，却终究由别的动力的撞击和带动而使自己长久保持着合规律的进程时，这灾难同时又是从粗野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的动力。”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③ 〔法〕列维·斯特劳著，于秀英译《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A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Religion

Bai Jianling

The nation is a basic concept in division the groups of human being. That is ,nation is a general rule and a popular phenomenon of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 Reli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sanctification in every nation's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and external distinction. Religion bear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which applies universally to every nation as a neutral concept. Thus religion has a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 Most Outstanding Chinese Romantic Poet Feng Zhi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Li Feng

Using Feng Zhi's poems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on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Christian Romanticism refracted i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are the internal motives for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to form. Feng Zhi's early life experience had led to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trong and gloomy lyric style and unique lyric temperament ,on the basis of which his empathy with German Romantic poets ,and thus a partly hidden and partly visible connection with Christian Romanticism could be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as embodied by Feng Zhi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uropean poets and theologians ,whos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etic theology" have indicated that theology does not have to be confined to grand halls and lectures; with poetic thinking ,theology can als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and reveal new modes of being.

Some Dimensions of Muslim Caste in India

Cai Jing

Muslim caste is a special social – cultural phenomenon in India and even in South Asia. It appeared under a given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background ,experienced certain development ,then presented in a hidden way. The caste among Muslims in India is comprised of Ashraf ,Ajraf and Azal in structure. Certain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indu caste system are also found among Indian Muslims ,namely ,a hierarchically order operates among Indian Muslims ,the various groups in the hierarchy are endogamous ,some of the castes have traditional links with hereditary occupations ,etc. Muslim caste in India differs from the Hindu caste model in certain details. Muslim caste in India constituted of two parts ,which epitomizes mixed culture attributes.

Bamboo King myths and bamboo worship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zhang Zeho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mboo king myth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how multi – dimensional reflecting the religious idea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bamboo king myths ,analyses bamboo worship reflected on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The paper holds that bamboo king myths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original thinking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imply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nature worship ,totemism and ancestor worship belonging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Bamboo king myths and bamboo worship have long – term impact on social lif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 ,its thinking of the myths reflects religious complex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ancestors of all ethnic groups.